

特邀主持人：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伟大实践所折射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命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的制约因素与策略选择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策略参考。

“一带一路”伟大实践所折射的新一轮 改革开放命题

文 / 萧琛 石艾馨

10

2017.1

摘要：基于三年多来的骄人战绩和超级项目的神速进展，结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践，反思、探讨与提炼“一带一路”建设这一世界性战略所折射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命题，提出以下五个观点：第一，转轨型经济大规模走向国际经营，当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开创先河；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奇迹再创辉煌的最合理最自然的选择；第三，“一带一路”让供给侧结构改革从容有序并为之赢得了宽广的英雄用武空间；第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与“去杠杆”相辅相成而且能带动中国金融更上一层楼；第五，“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改观外储利用效率，对于转轨型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格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7)01-0010-08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三年多以来，它所折射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改革命题应该说已经初步得到了很好的解答。就现实推进速度和国际经济合作规模而言，该战略的实践效果也都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大大超过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最初的预期。^[1]基于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骄人战

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专项基金（GX2013-1001（Z））

作者简介：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1；石艾馨，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北京市，100083。

绩和系列超级项目的飞速进展,本文反思、探讨与提炼这一世界性战略所折射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理论命题,并就前方可能出现的若干不确定因素及应对思路,发表若干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 转轨型经济大规模走向国际经营,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已经开创先河

历史地看,经济扩张与谋求海外政治军事霸权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起来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势必接踵而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列强为瓜分世界和扩大势力范围,最后都会突破国界向外输出资本,以透支东道国的要素红利并获取超额利润。两次世界大战经验表明,列强瓜分世界时难免都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随之便是国际军事冲突乃至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一个积极的国际机构发展的成果便是联合国体系的成功构建。其功能主要在于尽可能将各种冲突转化成对话和投票等和平解决途径。尽管该体系初衷设想无可厚非,但由于美国因素长期一家独大,结果是它对于世界事务几乎一直拥有绝对的否决权。^[2]进而国际经营的巨额红利也一直较显著地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倾斜。

现实地看,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显然同历史上列强们的资本输出模式大相径庭。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最多也只是一种倾向于赞誉的类比。因为,无论是就宗旨和性质、还是就规模和执行手段等而言,二者显然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首先,“马歇尔计划”,也即欧洲经济复兴基金,重要前提是当时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军事霸权。体现在联合国决策体系中,则是美国几乎一直拥有对于世界事务的“绝对否决权”。而中国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任务还没有完成。尽管中国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其投票地位显然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其次,“马歇尔计划”中,许多援助事实上都是食品等生活物资。而“一带一路”建设则不同,它要输出或曰援建的是相对先进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能,所侧重致力的是援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能力。换言之,前者只是帮助受援国从战争的废墟中存活并站立以来,而后者则要让受援

国的现代化得以加速进而迅速强大起来。再次,两者的资金规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马歇尔计划”的基金总额仅为130亿美元,而“一带一路”建设将至少投入千万亿美元以上。最后,两者的地域覆盖面也迥然不同。前者仅限于西欧诸国,而后者则已经覆盖了亚洲、非洲、欧洲乃至美洲等众多地区,占到了世界GDP的40%和货物贸易的25%,沿线直接途经的国家就达到29个,广义参与合作的国家更可达80多个。截至2016年9月底,已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国家就已经多达30多个。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比如,为“一带一路”建设所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2014年10月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到2015年4月的57个意向创始国,再到2016年12月的90多个成员国,发展势头不可谓不迅猛!

二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奇迹再创辉煌的最合理最自然的选择

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为摆脱下行压力而被动向外拓展产能空间的一种尝试。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一带一路”的动力来源,应该说主动的因素和被动的因素都同时存在。而前者却更符合“中国梦”和“复兴大业”的初衷。

作为转轨型经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在经过几十年超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之后,国民经济遭遇下行压力乃至出现周期性衰退等系列问题,本属于非常正常的情况。只是由于长期、中期和短期内形成的多种隐患,都集中地同时出现在当前时段,因而所产生的共震显然更具有挑战性、下行趋势也势必更容易显著化。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虽然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但目前仍然能保持在6%以上,这一增速仍然在全球遥遥领先,而这显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大环境非常不利的背景上。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日本不振、发展中国家面临量化紧缩的威胁,等等,都影响世界经济的扩张。

积极地刻不容缓地从供给侧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共识。鉴于“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中国经济近

期遭遇了类似西方经济学所谈论的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停滞膨胀”的局面。2015 年底，拉动国民经济的追加十一大工程需求曾高达 5 万亿之巨额，但结果仅导致了 10% 的“资本形成”。这样的拉动能力已经创下了 15 年来的最低纪录。民营企业实体经济投资速度的较快滑坡，也是非常令人堪忧的问题。早先，民营投资增长的高速度，一直是国有企业资本形成速度不足的一大补偿。但现在这种补偿却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民营投资的速率已经从 10% 以上的高位迅速下跌到了目前 2% 左右的低位。国有企业的资本形成，从统计上看，尽管仍能持平并略有上涨，但是大量贷款的注入效应显然不应被忽视。更严峻的是，2016 年 6 月以来，许多国有企业本应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巨额贷款资金，已经回流并躺在本企业在银行的活期账户之上。所体现的是资金不仅难以投入实体经济，而且也难以在虚体经济中找到好的出路。而这也许是几十年来从不曾出现过的情况，显然非常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投资不能形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成本过高、短板难补；另一方面则在于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杠杆太高、融资成本大于该资本的预期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途径显然是不能再仰仗凯恩斯需求管理，而应当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让企业重新拥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利润空间。继续一味追加需求的做法，只能是加剧“胀”却不能缓解“滞”。对于这种困境的认识乃至突围的思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早已未雨绸缪并率先有所布局。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视察并发表讲演的题目，就显然意味深长：“聚天下英才！”这不仅是“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简政放权”“民营新政”的灵魂，而且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灵魂和集结号。^[3] 战略方向无疑及时明智精准。最高领导不仅在运筹帷幄，而且也在不断地决胜千里。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西半球，已经相当于绕地球飞行了 10 多圈以上！他们所访问的国家已经超过 40 多个，拿到的巨额订单已经高达数十个以上。这些显然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在缓解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方面，“一带一路”显然是非常地明智对路和及时自然的战略选择。首先，“走出去”的能力已经相当厚实。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建筑业，其中主要的是房地产。二是制造业，小家电、大家电、汽车、建材家具、手机等通信设备，这些产能都已具备了大规模走出去的实力。此外，重型装备、高铁、核电、航天等，则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其次，中国对外劳务承包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相当的实力，尤其是近五年，这方面的进展几乎是在直线上升。最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更是遥遥领先。2014 年 6 月曾高达 3.99 万亿美元之巨，此后尽管有所减少，但 2016 年 10 月仍达到 3.12 万亿美元。然而在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这些外汇储备事实上很容易成为中国政府左右两难的棘手问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教授曾形象地称其为“美元陷阱”。^[4]“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之后，“丝路基金”和“亚投行”都得以迅速上马与高效运作。^[5] 不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研究开发、施工建设、乃至投资贸易等，都具有很大很匹配的融资能力，而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乃至资本账户打开，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居民的丰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地提高。“短缺经济”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应该说已经消失。而中国的邻居，东南亚、中亚、俄罗斯远东、非洲、拉美、东欧乃至南欧和部分西欧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还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设备陈旧和产品服务供不应求等等，急需外援到来。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宗旨就在于基础设施援建，道路、桥梁、码头、隧道、城市经营等，都是中国擅长并积极致力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多属于广义的房地产、正是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就业转型的领域。“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针对的则是内陆型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他们对于中国的适度领先技术以及相应的各类产品几乎一直在翘首以盼。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情况已经让世人刮目相看。不仅国际合作合同签订踊跃喜人，也不仅“丝路基金”和“亚投行”

进展神速、气势如虹,而且更具体的世界级的“八大超级工程”中的六项,已经迅速地商谈妥当并开始上马操作。其中有的甚至已经实现了土地的完全划拨。这里所述的六大超级工程包括:中巴高铁(瓜达尔港)、泛亚高铁、中亚高铁、中欧高铁、中俄加美高铁和(南美)两洋铁路。此外,正在积极谈判且成功在望的另外两大超级工程,还包括印度支那的克拉运河和南美的尼加拉瓜运河。尽管这些工程不无政治经济障碍,但其成功态势却一直令人看好。一个战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被证明成功的实践所支撑,这本身就表明这一战略选择非同寻常地合理与自然。

三 “一带一路”让供给侧结构改革从容有序并为之赢得了更大的英雄用武空间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精髓,就是要将经济活力归还给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和个人。活力归还的基本途径通常都只能是(大幅度地)降低税费,以强化各种制度激励、扩大生产性努力的营利空间。然而就现实条件看,立即实施大规模的完全到位的减税,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土地财政”和“唯GDP”的淡出,加上经济下行,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12年的20.7%,下降到了2015年的18.5%,而2016年前三季度又进一步下降到了16.9%。而相对于如此下降的税收收入,正式的预算支出却很难迅速地降低下来。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1至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6759亿元、同比增长5.9%,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7775亿元、同比增长10%。

可见,要说目前政府减税的力度已经到位,那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和不太负责任的。不难想象,这方面调整的空间还非常巨大。从2008年到2015年,我国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同期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的比重则上升了9个百分点。若立即返还这9个百分点,则意味着需要减税数万亿!而目前能够大幅度减税的操作却很难具备所需要的可行性。降低起征点的个税改革,应该是相当迫切的,但改革方案目前还只能被财政部上报中央研

究,何时出台还不得而知。企业所得税照理也更是应该大幅度降低的,因为实体经济投资的盈利已经极其局促。但目前的营改增,尽管已决定减税5000亿且保证只减不增,但还是出现不少蹊跷费解的问题。第一,这项减税优惠明显偏向房地产。房地产的库存积压大,便于作为增值税征收中计算应税收入时的抵免。有测算认为房地产大约要享受掉这一轮税收优惠中的60%。果如此,则其他众多部门恐怕就很难再享受到较多的幸运。例如高档酒店,其税费负担实际是上升了7%左右。于是它们联合起来集体涨价7%。应该说这样的事情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近年来高档酒店一直热衷的是削减价格的“降星运动”。^[6]

在精兵简政等深层体制改革一时难以到位,而减税的力度和精度短期内又无法达到理想状态的改革关头,“一带一路”建设更显举足轻重。目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很明确,也即只能侧重在顶住经济滑坡这样的防守面上,集中的举措便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这五大任务的中肯性和重要性显然都不言而喻,但这五项任务中的每一项,执行起来恐怕都属无比艰巨、甚至很难到位。例如“去产能”,下决心也许容易,但下岗工人及其家庭往哪里安置?就业转型能否同步甚至提前完成?否则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和债务问题,社会恐怕真的很难承受!事实上多数房地产企业之所以还能够维存活下来,一方面靠的是不断推高的房价,另一方面则靠的是银行不断注入的可供借新还旧的巨额贷款。

众多“杠杆见顶”的植物人企业,理论上都应该立即破产。但下岗建筑工人往哪里安置?海绵城市、地下网管,本应该吸收一部分,但是私人资本能够慷慨地向这类公共品投资么?政府本应挺身而出,但是资金能否充裕甚至足够?恐怕一时都是大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建设则可以缓解这方面的困难,大量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工程承包,就不失国内就业转型的好去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劳务承包,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多年的经验,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这么多的超级国际项目和巨型工程,且商务部已划分出了数千个PPP合作机会。总之国内房地产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应该说都可

以在新的空间上大展拳脚。

“去库存”的情况也是如此。国内钢铁产能过剩率曾高达40%，无疑是异常严重。但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却可以为它们找到好的出路。中国的钢铁质量上应该说算不上很高，但是用作高铁铁轨应该还能绰绰有余。上述的六大国际干线，几乎每一条的长度都是中国东西长度5000公里的若干倍。由此，巨大的钢铁产能乃至库存积压等一系列问题，理论上都有可能得到战略性地缓解。而且鉴于国内外价格差异，这些钢铁甚至不仅是找到了下家，而且还可能身价倍增，进而增加钢铁企业的利润，有利于资金回流和扩大再生产，直至企业活力得以完全的康复。事实上国内外期货市场上的钢铁价格已经开始在看涨。可见，这样的造血机制的形成，才是“去杠杆”的最为内在也真能持久的正向支撑。

其实，何止是钢铁的过剩能够得到缓解。从战略规划上看，“一带一路”建设的手笔真的是大得空前！它将要覆盖的是：全世界GDP的29%和国际货物贸易的25%，而其行程将超过81万公里！可以推想，它能吸收和容纳的中国的技术、资金、产能、劳工和智能服务，几乎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天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众多巨型工程，不仅本身耗资巨大、需求创造能力强大，而且后续的经营管理等服务工作，也仍然能够继续派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需求。这些对于国内企业、金融和就业的转型，无疑都是无比及时、无比巨大的缓冲。而在这个宝贵的缓冲机会中，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民营新政，抑或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基础性改革、甚至包括壮士断腕的高难度手术，势将都有可能得以从容的解决。否则，一系列“硬着陆”事件恐怕很可能要让中国经济陷入漫漫的中等收入陷阱。

不妨就上述六大超级国际工程中的中巴高铁案例作一点分析。这条高铁也许并不很长，仅为1330公里，但它要跨越地质结构异常复杂的多个国际区域，施工难度非同寻常，对于资金、钢铁、技术、人力的需求显然也非同凡响。这条铁路将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由中资企业管理运营）为起点，连接伊斯兰堡—喀什—乌鲁木齐—西安—北京—天津。目前中国已经获得了瓜达尔

港43年的使用权，2281亩土地已经全部交付中方。拿到土地之后，热火朝天的新城建设热潮已经掀起，深圳的经验正在那里生根开花并发扬光大。中巴双方现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条铁路及其海港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极大。从运输上看，可以替代13000公里的经由陆路、下南海至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进而到达霍尔木茨海峡的里程！节约将近10倍的运输距离和更多倍的时间。有评论认为，它打通的是一条中巴经济走廊，等同于为中国在西南边陲再造了一条新的海岸线。总之，这条高铁加上瓜达尔港，势将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保障线。有了它们，海湾地区的石油可以直接在瓜达尔港上岸运输到中国，无论是距离还是安全性都将极大地提高。这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显然都是得力的辅佐与支撑。

四 “一带一路”不仅与“去杠杆”相辅相成而且能带动中国金融走出困境

毋庸讳言，现阶段我国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成本过高等困难委实相当严峻。有规模工业的过剩率高达22%，近三分之一的企业过剩率为30%，煤炭、钢铁的过剩率甚至达到了40%。按市场原则，这些企业当然应该破产。相比之下，现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恐怕要远低于如此严重的过剩率。实体经济的盈利平均地说目前大约只在5%甚至更低的水平。对许多行业来说，实体经济能否继续盈利，甚至成了一种疑问。沉淀资本比较多的行业，或许还一直存有一个较大的惯性、进而处于一种维持的状态。但是，新的资本形成，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性的要求。那就是，融得所投入资金的成本，必须要低于用该资金投资生产的预期利润。否则，资本形成将很难不被窒息。这也是目前国内资本形成急剧下挫的症结。

就资本形成的结构来看，虚体经济风风火火而实体经济冷冷清清，也许是最流行的写照。^[7]美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中国80%的经济利润，是落在金融这个相对虚体的领域。可以观察得到的实际情况，也许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佐证。总体上讲，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也许并不悲观，他们在新三板、中小板、创业板、炒作万科、土地流转乃至海外资产配置等各大战场上，可谓一直是在攻城掠地，干得风风火火。而国有企业的

资本运营部，近几年来也的确是相当活跃。

拉上需求时产出却不再向上增长的空前未遇的新情况。一定意义上，可以类比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停滞膨胀的困境。滞胀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曾经持续十多年以上，表现为经济走走停停，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通货膨胀却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通货膨胀不仅表现为 CPI 和 PPI 指标都处于危险的状态，而且还表现为国家债务、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的严重累积。之所以这里只说是类比，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支撑基础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迥然不同的。中国这种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经济，实质上还只是一个模拟的市场经济，只是在借助市场杠杆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实现多元化增长。因此，中国目前的货币超发、影子银行、灰色贷款乃至债务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绝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统计的指标，否则其诊断势必容易陷入迷途。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惠誉国际、标准普尔和摩迪对于中国信用风险的异口同声地降级，其实是因考虑得不周而严重偏向于悲观的。

中国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等，尽管看上去的确非常地危险，但却远不像西方专家们所评估的那样悲观。因为，中国的货币超发和债务猛增，事实上是带有强烈的制度属性和主动色彩。它也许会突然严重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也很容易被控制到平静无忧的程度。首先，唯 GDP、土地财政、经营城市等，都导致地方政府和其他当事人过于亢进，仿佛吞食了大剂量的兴奋剂。硬件工程、面子工程、房地产等，都以高的利率从国有银行贷款，预期乐观过度和不计成本的投资失败的情况应该说很不鲜见。可见，今天险象环生严重超标的指标，其内涵都事实上包括了所谓的“兴奋剂”问题。其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对立的关系也远非西方专家所能亲身感受。打个比方，中国国有机构之间的债务，可以说有点像是财政部的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因为他们事实上接受的都是政府的一元化领导。因而“逼债”“破产”等情况显然与西方迥异。最后，货币信贷发行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法律封顶，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而反过来，这些因素都偏向于极大地增强政府对于信用危机的掌控能力。

可见，能否走出金融困境、能否有效地“去杠杆”，关键还是要看政府能否选定更加明智的突围线路。当然，首先应当要去掉兴奋剂，让亢奋的状态得以消停，而这一点中国已经基本做到，远不像西方专家所想的那样困难。目前看来，有几条突围思路都还是相当畅通的。就国内而言，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去产能的缓冲，具体用途包括海绵城市、雾霾治理、房地产去库存等，这可以正向挪动 1/3 过剩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等流动性。此外，其他过剩的流动性，一部分可以引导到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上去，还有一部分可以引导到国际合作经营，包括先富起来的人的大量的海外资产配置。最后剩下的一部分，显然将与“一带一路”建设休戚相关。目前看来，政府正在上述三条正确路径上酝酿蓄势，党的十九大之后乃至“十三五”期间，这几个方面的推进与实现，应该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总之我们有理由断言：中国金融“高烧”的治理决不比西方莫名其妙的金融“低烧”的治理要更加困难。

五 “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改观外储利用效率，对国内外经济影响深远

长期改革开放的结晶之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全世界最为雄厚的外汇储备。然而一个非常蹊跷的经济学现象则是：中国作为在海外拥有巨额资产的最大的债权国，其国际资本净收益竟然是零或负数。这其中的“暗物质”，也就是美元体系有所偏向的潜规则，应该说不无巨大作用。国际铸币税和国际外汇储备制度，一直在导致若干核心货币拥有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众多机会。而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则处于处处被掣肘、时时有被动的境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说“金砖五国基金”和“一带一路”建设下的“丝路基金”只是新兴经济体的小试锋芒，那么最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应该是中国公开拉起了自己的国际金融大旗。目前在这杆旗下已经至少聚集了 90 多个国家。

金融崛起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进攻性目标，也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并减少不必要金融损失等防守

性目标,而且还会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缓释国内货币超发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人民币被接纳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五大货币后,其国际储备需求显然会急速提高,近几年内应该可以缓释10%左右的国内过剩的流动性。这显然能够为国内的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改革开拓极其宝贵的空间。此外它也为人民币外汇资产的市场性自由浮动创造了更为自由和更为有利的条件。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将被允许贬值20%~40%。这对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对于国内的资产膨胀和价格膨胀,对于中国企业出口换汇的需求增长,显然都具有积极巨大的正向效应。

货币超发在现阶段已经导致了几大资产泡沫,如房地产、外汇、地方债务等。最影响社会稳定和大众民生的资产当然首推涉及亿万家庭的房地产。稳定这份资产的价格,对于社会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意义显然至为重要。相比之下,外汇资产的持有人则主要是一些先富起来的或比较特殊的人群,如需要出国的居民或需要国际经营的企业家。若要汇率稳定,则人民币的购买力必须保持稳定,进而货币贷款的扩张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而那样对于房地产的价格稳定甚至涨价势必非常地不利。2016年1月份2.5万亿天量信贷的发出,可以说是2016年房地产金九银十乃至地方政府债务有所缓解的重要注脚。

可见,不保外汇泡沫,毕竟只是不能顾全少数富人问题。从俄罗斯的实践和我国近期的货币政策动向来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市场化浮动,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再上一个台阶,应该说是具有促进作用的。对于人民币在SDR中的未来估值调整,应该说也是更为有利和节约的。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推进及其经营绩效,对于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地位和前途,应该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带来藏汇于民的局面,而这显然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进而还可以为人民币资本帐户的最终打开,打下更为厚实的基础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不难推知,当国内外货币规则进一步趋同的时候,则人民币的超

发机制将势必要受到更多的国际约束。反过来则会助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在筹备亚洲投资银行的进程中,西方一些国家曾经冷眼相看,认为中国一股独大,势必趋向“绝对的否决权”,因而面面相觑、裹足不前。但在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博大胸怀之后,很快便纷纷站到了北京大旗之下。英国甚至不顾美国侧目,毅然率先投入到亚洲投资银行的筹办行列。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哪一个不搞霸权的国度,能够将如此庞大的建设计划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这样的境界对于未来的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前途,已经预兆出了相当灿烂和令人乐观的前景。国际投资合作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或曰不确定因素肯定是十分多样与复杂的。首先,大国关系、小国关系,都不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棘手之处。由于种种不可抗的因素,投资建设效益的未来的如期回收,应该说是一个值得担忧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有企业,体制文化与对手们都相去甚远,法治水平、契约精神、宗教文化,也都更有很多的难点。最后,作为国家的“代理”,企业的“忠诚”历来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管理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不过解决这类难题的信心已经到来。大数据就是时代赋予我们至为宝贵的礼物。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言:“你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暂时地欺骗全部人,但你不可以永远地欺骗全部人。”^[8]只要数据足够,任何不良企图都将难以遁形。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物联网时代的区块链技术(block chain),已经为全世界带来了令人欢欣的福音。古老的拜占庭将军问题,也即在相互信任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也能达成最佳合作的命题,现已在物联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中初步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中国是世界互联网中心,在全球大数据规则制定方面,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中国的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正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网络领军人物们已经多次亲临贵州小深圳“贵安新区”视察。有理由自信:技术民主、技术效率,去中心、去权威、去信任等新理念,势必能为“一带一(下转第29页)

体育交流,争取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对外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邀请更多重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要员、国际名人来中国考察访问。同时,要充分发挥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等对外政府平台的作用,构建企业对外出口信息平台的同时,积极宣传打造中国的正面形象。要注重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全力构建友好和睦的国际交往环境。

注释:

[1]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2] 卢锋:《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于津平、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 孔庆峰:《“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

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2期;张晓静:《“一带一路”与中国出口贸易: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亚太经济》2015年第3期。

[4] J. Anderson, E.V. Wincoop,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1 (2003), pp.170-192; E.K. Choi, J.Harrigan, “Specialization and the Volume of Trade: Do the Data Obey the Law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p.85-118.

[5] J.F. Brun, C. Carrere, P. Guillaumont, J.d. Melo, “Has Distance Died? Evidence from A Panel Gravity Model”,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9, no.1 (2005), pp.99-120.

[6] T.Be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re A Li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57 (2002), pp.107-131; T.Beck,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1, no.2 (2003), pp.296-316; A.Berthou, “The Distorte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CEPII Working Paper*, no.2010-09 (2010).

责任编辑 马相东

(上接第16页)路”建设管理方面的困惑带来无限的希望。

注释:

[1] 习近平:《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第01版。

[2] 重大问题在联合国通过需要80%的赞成票,而美国一国最多时能拥有25%的投票权。

[3] 萧琛:《论中国资本市场“倒金字塔”结构的矫正——“简政放权”“草根创业”与股市供应面改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 Paul Krugman, “China's Dollar Trap,”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9;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

2010年第3期。

[5] 杨丽花、周丽萍、翁东玲:《丝路基金、PPP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博弈论的视角》,《亚太经济》2016年第2期。

[6] “反四风”“八项规定”以来,五星级酒店申请降低到四星级,四星申请降三星,以此类推,一直是近些年的趋势。其目的是降低价格,以便旅客不再敬而远之。原因是公款消费已经变得非常严格。

[7] 萧琛:《去广义虚拟过度与“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返璞归真、清晰投入产出与振兴实体经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8]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责任编辑 马相东